



人本发展经济学

■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

◆ 李宝元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李宝元 / 著

人本发展经济学

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高进水 刘 颖

责任校对：桂裕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金 印

人本发展经济学

李宝元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永胜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 开 36 印张 695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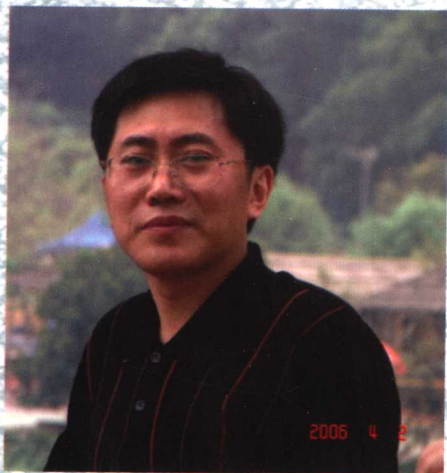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100 册

ISBN 7 - 5058 - 5786 - x/F · 5044 定价：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李宝元，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研究会理事等职。

作者长期在高校从事经济学、管理学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曾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福特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十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全国著名文献转载或转摘；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十余部。

主要研究方向：人本发展与管理。涉及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和体制改革，教育经济与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

近年来主要著作：

- ◇《战略性投资》（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版）
- ◇《追求永远》（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版）
- ◇《人本方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版）
- ◇《战略性激励》（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第 1 版，2005 第 2 版）
- ◇《人力资本运营》（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1 版）
-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版）
- ◇《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计划》（济南出版社 1997 版）
- ◇《广告学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 第 1 版，2004 第 2 版）
- ◇《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程》（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 版）
- ◇《宏观经济分析》（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版）

内 容 介 绍

《人本发展经济学》，是作者基于二十余年学术探索，并结合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趋向和前沿课题，所做的一个“创造性转述”。全书以现代经济学人本化新趋向为基本标度，特别是充分吸收和发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的思想精义，基于“三域耦合再生产”理论模型，从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三个基本维度，以及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方法论整合视角，将有关宏观及微观发展经济学理论，资源、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理论，家庭、生育和人口经济理论，教育经济与管理理论，文化、科技和信息经济管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及体制变迁理论，以及产业分类和结构演进理论等多学科的核心命题和前沿成果，做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梳理和有机整合，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新见解、新思路和新方法。

全书共分五篇，每篇三章，共15章。第1篇关于人本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首先在大自然演进的宏观界面审视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轨迹，其次阐释了发展的实质是拓展人的主体性自由这个核心主题，而后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本发展经济学方法论及总体理论体系。第2-4篇是本书的主体内容，分别从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三个基本维度上论述分析了人本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环境约束；“农业国工业化”的人本发展含义；以满足基本需要为目标的生存自由意义和战略选择；家庭生育行为与宏观人口政策的权衡；教育产业在人力资本形成和人本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及作用；医疗卫生健康投资的社会自由意义；文化娱乐产业的运作框架及发展趋势；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本意义和战略取向；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存和民主化进程等。第5篇从人本发展的总体整合视角对制度创新路径和产业演进规律进行了概要描述，最后讨论了以自由为核心量度人本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系列方法论问题。

《人本发展经济学》适合于大学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作为发展经济学或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前沿课程学习研究的主要参考书，也是一切关注“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的学者、教师、官员和其他各界人士选择参阅的一部重要学术文献。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Econ

一切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学说，归结到底，其实都是关于人类自身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即：人们在稀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下，如何在技术上挣脱自然压迫并与之和谐共处，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谐社会以与他人友好相处，并最终于内在的心智追求中获得自我超越，从而完满达成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总福利目标。

作者题记

摘要

“人本主义”（Humanism）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而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原初，其基本含义是指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价值的弘扬或复兴等，后来在工业化背景下逐渐异化为一种对抗大自然、甚至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科学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思潮。所以，今天我们强调发展的“人本”意义，提倡“人本发展观”，并不是在价值观、世界观或宇宙观的自然哲学层面上提倡“人类中心主义”；恰恰相反，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类发展的“人本”意义，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在自然哲学意义上放弃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诠释回归自然理性的“人本主义”理念。这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认识论基础。

一般地，我们可把“发展”说成是事物（特别指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从自由主义视点来看，所谓“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现实中理性地追求“自由”的历史过程。人本发展，首先要在大自然演进中的人类发展意义上去认识和界定，而人类发展实际上是大自然演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对于大自然演化进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或结果。从大自然演进的宏观视野考察人类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因而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这样的悖论，即：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人类“理性”追求角度，就人类发展来说，正确的观点应该是“自然的自由观”，即在达观承认大自然演进秩序的基础上，将发展看做是以人类理性为“自由”目标而不断进取扩展的历史过程。完整地说，发展的实质意义和



过程可以这样加以概括：人类在“必然”（不自由）的自然秩序框定下，凭借自己天然的“理性”（自由意志），经过艰辛曲折的努力（自由路径），在积极奋争中能够因应情势采取互动、妥协、调和、平衡等策略艺术（自由手段），从而不断逼近作为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的“自由王国”。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从自由的“建构性”（Constitutive）角度同时联系其“工具性”实质（Substantive）意义，作为发展首要目标和主要手段的自由，可以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等三个角度来认识，从而可以划分为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这样三个基本层面。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基于三层次自由的发展含义，同时在相应逻辑层次上给出一个推广了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图式（我们简称为“三域耦合模型”），并以此模型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在宏观动态上描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本自由指向，从而正面阐释“发展是拓展人类主体性自由”的主题思路，形成完整的人本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经济学方法论来看，实践中人们的“理性”选择之所以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其信息论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不完全”。相对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来说，其所处环境具有太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地点，将关于环境的“信息”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或最大化目标，充分、准确、正确地予以掌握和运用。一个人的任何理性选择，其实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时间和空间）约束下“最经济”地运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要研究“发展”问题，必须突破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范式的局限，在一个加进时间演进因素的动态框架内，将普适性的分析方法从“个体选择”层面延伸到整个“社会选择”领域，去研究“不完全信息”对于社会选择行为以及发展正义目标确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总体整合视角上来看，人本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和内容就是：在“最大化理性行为”的基本假定下，以人为中心和研究聚焦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等基本经济学工具，探索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经济社会如何选择适当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以缓解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从而使社会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结构优化演进以及人类福利状况得到不断改善。

2

从生存自由层面来看，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受制于其所存在其间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条件，并在挣脱自然束缚的过程中创造出辉煌的工业文明，最



后又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重新陷于新的自然压迫和生存困境之中。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人本发展问题,诸如:人类发展受自然资源环境约束的生态学意义是什么?“可持续发展”如何从理念到行动?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何在?历史演变脉络又是怎样的情形?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思路(包括其哲学基础、量度准则、实施策略和能力建设等)有哪些问题需要以人本观点给予重新评判?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在殖民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熬煎中的“落后国家”如何求生存、谋发展?它们如何以人为本解决好“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有关城市化问题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发展中国家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为什么要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来追求“生存自由”,以逐步推动社会经济从“温饱”状态走向“小康”目标?对这样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阐释和回答,构成了人本发展经济学“基于生存自由”层面的基本内容。

某特定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及其以外的空间及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生存的所有事物(包括生物的或非生物的),构成了我们常说的“生态系统”(Ecosystem)。对人类本身发展来说,生态环境及其维持受其自身行为直接影响,而自然资源稀缺性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基本物质技术约束。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个别人、企业、单位、群体、集团和国家的行为或活动,都有自己(正面)的特定目的和利益,但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共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从维持和增进人类福利的角度来看,环境经济问题的核心是人们为了各自的直接利益、具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而进行的个别或局部活动,由于对环境造成破坏或污染,从而给全人类整体生存和长期发展带来的间接利益损害;而自然资源最本质的经济学属性就是稀缺性(Scarcity),即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自然资源不是应有尽有的,在绝对量上是有限的、在相对量上随时空情景而变化,在实际中存在竞争性利用状况,在供需关系上表现为效用价值及价格变化。围绕资源环境的上述基本矛盾和问题,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评估,研究、设计有利于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维持和保护激励机制及制度规则,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和战略思路,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曲折迂回的演变过程:伴随着近现代以“工业化”及“后工业化”为主题的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理性由“自然秩序”中解脱出来后,逐渐在科学主义指引下走向“致命的自负”甚至“狂妄”,后来在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危机压力下“幡然觉醒”,最终从理念倡导付诸到实际行动。关于“可持续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包括哲学基础、量度准则、实施策略和能力建设等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从自然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来看,如果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一次性、单方



向直线式经济,那么,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应该是一种“从摇篮到摇篮”资源多次性再生循环利用型经济。以人为本,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从人本经济发展观点来看,农业国“工业化”、农村社会经济“城市化”是人类近 200 年现代化进程中“在物质生产领域追求生存自由”这个宏大历史使命的两个基本维度。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类在物质层面追求生存自由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工业化是其在产业结构变革维度上的具体体现,它为现代入本化经济发展提供了社会生产力动能基础;那么,城市化就是其在区域分工变革维度上的实现形式,它为现代入本化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空间递进势能。入本化乃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历史标度。从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第一次现代化,到以“知识经济”为目标的第二次现代化,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就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通过发展资本、特别是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来发展财富、发展自身的全面个性和生命意义。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系列基本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工业化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缺失”和“结构刚性”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现实,按照“提出假说—经验测试—构建模型”的实证研究范式,探索发展中国家通过何种发展道路和方式才能从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转变为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其主要政策含义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转变,变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为现代一元化经济体系;鉴于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瓶颈”约束,应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资本,通过投资的“大推进”获得社会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在平衡与非平衡的动态博弈中,依托市场扩展秩序,同时借助有限制的政府计划调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正当模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要特别注意研究和解决好“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理性把握农村社会条件、农业剩余基础和农民利益激励机制,因势利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从城市方面来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城市化,即从传统农村经济转变为现代城市经济的一种社会变迁和自然历史过程。从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具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和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历史起点、体制背景和经济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等特殊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需要走自己的路,遵循城市化一般规律,同时选择切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在近代经受了百余年的民族压迫、内忧外患、饥寒交迫和战乱冲突,终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翻身得解放”;但“革命虽然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族振兴的百年梦想远没有实现,现代化以及伴随着现代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任重道远。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战略,应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八亿农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统筹安排农业与工业关系、农民与市民关系、城乡区域关系,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三域耦合”模型的物质生产活动层面上来看,人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向就是获得“生存自由”。而要获得生存自由,人类必须拥有可持续的“自然资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其价值功能),拥有满足“基本需要”的收入和物质条件。为此,就需要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出发,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基础,以绿色 GDP、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等综合指标为基本衡量标尺与反贫困指针,不断追求“生存自由”,逐步推动社会经济从“温饱”状态走向全面“小康”目标。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人本发展经济学所要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

3

从社会自由层面来看,人们要获得温暖、爱怜、尊重等,往往最直接地需要借助家庭、学校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人與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活动来实现,而这些活动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所谓“人类自身生产”领域;换句话说,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活动,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在满足人们社会交往需要方面具有最直接、最核心的地位和作用。从三域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来看,人口数量增长、素质提升和结构演进,实际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类自身再生产长周期发展之必然结果和表现形态;同时,从人力资本理论观点来看,教育是从事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的一个主导产业,其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存亡兴衰大命运,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如何以制度创新为先导推动教育业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最关键、最核心、具有挑战性的战略问题;同样地,在三域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下,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技术问题,更本质、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式,是人们获得社会自由、实现自由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在此层面上,人本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关于家庭作为人类自身生产基础部门的社会经济意义,以家庭生育行为和生育率理论为微观基础的人口再生产、人口转变阶段和人口发展趋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适度人口规模控制,以及人口迁移和人口结构演进规律;(2)关于教育业的经济属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主导产业职能定位,教育人力资本生产运作机制和规律,以及在国家竞争战略层面上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向和策略;(3)从获得“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最高社会目标出发,医疗卫生的人类自身生产性质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战略地位,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的健康投资意义及其基本途径与实现形式,以及国家健康投资政策应有的基准目标导向和具体实践操作策略。

人是“文明的天使”,同时也是“万恶之源”。从一个角度看,每一个生命个体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大自然的恩惠”,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或她是给人类社会文明增添了多样性的一分子,所以是“文明的天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一增量是在人口群体存量已经达到社会资源环境阈值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他或她所带来的就不是“福音”,而是更多的承载负担和麻烦,是与贫困、污染直接相关的“人口问题”,因而成了“万恶之源”。关于“人权”即人本权利,其实质意义无非是说,要按照“以人为本”原则来界定和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而是一定社会群体中作为“成员”存在的行为主体;从这个观点来看,家庭及其中的妇女和其他成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社会成员群落中的一种基础性微观主体。这种基础地位和作用首先集中体现在家庭的生育功能上,这决定了家庭在控制人口存量和增量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决定了家庭在解决人作为“文明的天使”还是“万恶之源”内在矛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次体现在家庭的人力资本维持(生活消费和安全维护)和投资(教育培训及医疗卫生保健)功能上;进而言之,由婚姻、血缘、收养行为引致的各种家庭人际关系和生活经验本身,就构成一个人一生中不断进行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力资本形成和提升最一般、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说,与物质生产领域的农业部门基础地位相类似,从人类自身生产角度来看,家庭也是最基础性的生产部门和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及其成员的权利是最原始、最基本、最基础的“人权”,“以人为本”首先要以这种行为主体的自主权利为本。从人本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计划生育首先是一种家庭及其成员特别是妇女能够自主地根据成本-收益关系分析进行“理性”选择的生育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自主考虑其经济条件和生育状态而理性安排他们的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一种“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新家庭经济学有关学说为家庭生育行为和家庭计划活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根据这些理论,家庭生育行为和家庭规模大小具有深刻的微观理性基础和经济根源,任何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的制定及实施都要首先以此为依据,任何违背家庭理性选择行为的宏观政策和措施都注定是无法有效实施的;同时,任何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所依附的人权与伦理法则,都要首先维护妇女生殖健康的基本权利,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权利,这是追求整个社会自由权利的根本基础和动力源泉。此外还要看到,高度分散化的家庭生育行为最终集结的社会宏观结果往往会产生“合成谬误”,生育活动的家庭成本收益率和社会成本收益率往往不一致,这就导致了宏观生育政策与家庭生育决策之间持续存在的理性悖论、视点错位以及利益矛盾和冲突。一个国家宏观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须根据有关人口经济学理论充分估



计和正确把握人口转变、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及人口结构演变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关系。

在我们的三域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教育业属于人类自身生产领域的主导产业部门,它在人力资本生产和形成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自由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来看,教育业是从事人力资源开发、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的一个主导产业,其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能否从一个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直接关系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的观点是“教育兴国先兴业”,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制度问题;如何以制度创新为先导推动教育业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战略任务。教育制度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其一,对现有国立教育机构同样按照“抓大放小”的思路进行撤并、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合资合作及拍卖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对于可以作为国立的也应彻底改“国办”为“国有校办”,真正把办学自主权放给学校;对于其他可以非国有化的应视不同情况实行公办、民办、合办、个人办、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办等多种办学形式,形成多元化并存、公平竞争的教育主体格局。其二,要积极培育各种类型的教育市场,形成规范的教育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有关教育市场准入、正当竞争的市场法规和运行规则。其三,彻底转换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使之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教育上真正转移到“调”和“管”教育方面上来,把具有普遍公益性的公共教育领域、教育规划和调控及教育市场秩序规制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和职能范围。通过市场化制度创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学校自主办学-政府公共治理-社会多元合作”三位一体教育产业运行的制度框架,是革除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弊端、实现教育超前快速发展的突破口和契机。中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选择和定位,总的来说应该是:以“全面深度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人力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本强国”为基本目标和任务,以“市场化的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和契机,分阶段、有步骤地构建一个“个人终身学习-学校自主运营-市场机会均等-社会全面开放-政府依法规制-国民素质提升-国家实力增强”的现代大教育主导型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健康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永恒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基础、基本途径和必要手段。从人力资本理论及三域再生产模型的观点来看,如同由教育产业形成的知识技能一样,健康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存量,它也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特殊“产品”成果,通过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这样两种基本投资途径或生产形式得以形成和积累。在这里,我们将医疗卫生不仅仅看



做是一个医学技术问题,更本质地看做是一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是经济资源有效配置问题,是市场机制基础上产业运作模式选择问题,甚至是一种关于社会福利目标选择和人本发展战略决策的“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问题。健康的基本实现途径有二:一是医疗保健市场运作机制,二是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前者解决健康资本投资和形成的效率基础问题,后者决定健康福利目标实现的公平规则问题,它们是健康(医疗卫生)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课题,也是人本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相对于人们的健康需要来说,医疗卫生资源同样是稀缺的,因此如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有效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以很好满足人们健康需要,自然也是健康(医疗卫生)经济学和人本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保健市场具有一系列特殊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供求主体具有更明显的信息非对称性,其决策和选择行为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并由此决定了医疗卫生产业运作需要有相应的特殊制度安排,诸如:形成三位一体医疗经营主体格局,加强医院运营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发展非营利性医院并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引入商业和社会医疗健康保险机制等。至于公共卫生系统,则是指由政府等公共机构着眼于整个社会或社区人群健康状况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化服务体系。从人本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健康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自由,或者说是社会自由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也是社会自由实现的一种基本形式。健康权是基本人权,人们能否普遍地拥有健康、拥有健康能力和机会,是衡量一个社会人本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过来说,人民不能拥有基本医疗保障条件,大多数民众没有健康的可行能力,是社会贫困和落后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也是任何社会文明和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院组织制度创新,加快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步伐和加强国民健康公共投资力度,向广大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补贴,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和提高社会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应该成为政府医疗卫生政策选择和国家人本发展战略决策的基本方向。

4

从精神自由层面来看,在现实中人们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境界,最直接或主要是通过文化娱乐、科学技术及信息传播等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来达成的,而这又需要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支撑,并在人们借助人类自身生产活动获得足够的“可行能力”之后,才有可能充分地实现。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实指的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开展文化娱乐、科学技术及信息传播等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使每个社会成



员都能够进入“自我实现”的精神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行为规范、艺术修养、科技素质、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都达到一种高度文明和谐的状态。如果说文化艺术体现是一种人类感性层面的精神自由，那么科学技术就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理性层面的精神自由，而信息是人们经济社会交往过程中借助一定载体表达有关事物、人物或事件存在状态和特征的文化符号。从我们的三域再生产理论范式来看，文化娱乐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精神生产领域的基础部门，目前文化娱乐业的大规模生产、商业化运作和大众性消费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精神生产活动的基本模式；而科学技术作为支配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一种主导力量，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巨大，树立“科技以人为本”新理念，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战略焦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将人们带入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数字化生存”，并在不断加快的“民主化”进程中引领人类精神走向更加自由的新时代。人本发展经济学在这个层面的基本任务就是：将文化娱乐产业作为人类获得“精神自由”之基础，站在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研讨有关文化娱乐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立足人本经济发展视角，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产业前景进行描述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讨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相应的战略选择问题；阐释“信息”概念所蕴含的人本意义，分析描述信息化浪潮及其给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客观勾勒电子网络技术和大媒体产业支撑下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及民主化社会进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以人本经济发展观点研究探索中国信息产业及信息经济战略选择和发展道路。

文化娱乐，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基础、最普遍的精神文明形态，文化娱乐产业发展是人类追求精神自由的经济基础，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和主题之一。从我们的三域再生产理论范式来看，文化娱乐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精神生产领域的基础部门，其地位相当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农业、人类自身生产领域的家庭生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如果说农林牧渔是最基础的“物质支撑”、家庭生育是最基本的“社会基因”，那么，文化娱乐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精神支柱”。在当代社会，休闲、娱乐、游戏以及从这些文化消费活动中获得的“高峰体验”，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文化娱乐业的大规模生产、商业化运作和大众性消费，也已经成为支配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一种主导力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精神生产活动的基本模式，成为这些国家角逐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成为后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实现精神愉悦、追求精神自由、获得精神文明和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源泉。相对来说，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比较迟缓，文化娱乐产业化发展也比较滞后，无论在文化企业



经营管理水平、文化市场商业化运作规范上还是在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管理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文化领域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重重、问题多多,并已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常进程。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文化市场化制度创新,明确文化娱乐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取向,并顺应当今国际市场文化产业竞争大趋势而积极推进之。

如果说,文化艺术体现的是一种人类感性层面的精神自由,那么,科学技术就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理性层面的精神自由。科学技术的主导社会功能与它作为人类理性自由的内在性质和实现形态紧密相关。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认识必然、明确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从而自觉地利用自然赋予的条件来“巧夺天工”,并获得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社会性变革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的一种特殊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推动力量往往是巨大的、令人惊奇的和具有革命性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并不断发展壮大,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不断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需要“与大自然作斗争”,做出一个又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举动,其凭借的就是这种理性的精神创造力量。一来二去,人类理性走向“致命的自负”,走向市场这种“自然扩展秩序”的对立面,往往倾向于利用各种人为的“计划”工程去干预经济事务、推动社会进步,最终走向有可能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全部毁灭的可怕境地。为此,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科学技术这种“理性”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本身生发的理性主义倾向,清醒认识、坚决反对和积极克服与这种理性主义“不谋而合”的传统“计划经济”思想方法及其给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和科技产业化发展所强加的“精神牵制”,大刀阔斧地革除政府行政性分割和计划性垄断障碍,将科学技术的“有计划”发展真正置于人类自然扩展的“市场秩序”之上。总之,我们要正面认识到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清楚科技发展的人文伦理边界在哪里,树立“科技以人为本”理念,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互动机制,有效防止科学技术发展走向极端理性主义歧途,引导科学技术活动始终朝着人性化、人本化的理性自由目标健康发展。

从社会经济系统来看,信息是人们经济社会交往过程中借助一定载体表达有关事物、人物或事件存在状态和特征的文化符号。信息传播是任何社会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传递、存储和拥有信息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形态,也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20世纪中叶,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主要以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信息资源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一种在新兴信息产业为主导和支柱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即“信息社会”逐渐露出水面,从而将人们带入一种全